

未聽到的中國聲音： 文革時期福音廣播聽眾來信所見的「第二社會」^{*}

邢福增^{**}、國斐^{***}

摘要

在中國當代歷史，文化大革命普遍被視為「浩劫」、「災難」、「動亂」。中共全面執行消滅宗教的政策，所有宗教體制悉遭政治運動摧毀，宗教只能以非制度化方式在地下發展。關於文革期間基督教情況的研究，幾乎長期空白。香港的遠東福音廣播公司保存了從1966年至1978年的252封中國各地聽眾的來信，本文嘗試以這一批極具研究價值的民間史料為文本，並援用「第二社會」的概念，來重探文革期間中國基督教的面貌。在冷戰局勢氛圍下，宗教電臺對共產中國進行廣播，背後有其意識形態，而中共官方及民間對「敵臺」的回應也有所不同。藉由分析這批信函，可發現中國草根民眾是甘冒風險收聽境外福音廣播、寫信到香港電臺述說其故事，當中不僅呈現了當時尋道者及基督徒的心聲，也有助於我們重構文革期間中國「第二社會」中基督教發展的獨特圖像。

關鍵詞：宗教廣播、聽眾來信、文化大革命、中國基督教

* 本文為香港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General Research Fund）資助項目研究成果（Project CUHK 453113），謹此鳴謝。本研究能順利進行，蒙香港遠東福音廣播有限公司授權本人使用中國聽眾來信，謹此致謝。同時，作者特別感謝兩位評審人提供的寶貴意見。

收稿日期：2019年2月13日，通過刊登日期：2019年11月15日。

**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授、院長

***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研究助理

一、前 言

（一）文革時期的中國基督教史

1949 年 10 月中共建國以來，中國宗教不僅要面對政權轉易的動盪與挑戰，更因新政權奉共產主義為官方意識形態，其無神論主張是否會對宗教發展帶來衝擊，也引起眾多宗教信徒極度關注及憂慮。

關於 1949 年以後中共的宗教政策，楊鳳崗曾區分為四個階段：（一）1949 年至 1957 年的合作與控制；（二）1957 年至 1966 年的社會主義改造；（三）1966 年至 1979 年的消滅宗教；（四）1979 年迄今的加強管理。¹其中第三個階段正是中國社會最為動盪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在中國歷史上，文革被視為「浩劫」、「災難」、「動亂」。這段期間，中共全面執行消滅宗教的政策，連黨國支持成立的愛國宗教團體也都停止運作，宗教活動場所被紅衛兵佔據，宗教教職人員受到批鬥與改造，甚至連官方的宗教管理體制（統戰部及宗教事務局）也受到衝擊。

就基督教的情況而言，中共自建國以來，即以打倒帝國主義為名對基督教厲行改造。²1950 年代以降的歷次政治運動，對中國基督教會帶來不同程度的衝擊。³文革期間，宗教組織悉數停止運作，宗教活動場所遭到關閉，基督教主要以地下形式存在。這無疑也為後世研究者重構文革時期基督教的發展，增添極大難度。關於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基督教情況，過去主要依靠一些分散的信徒見證紀錄，⁴不論在文革史或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領域，均長期處於空白狀態。

¹ Fenggang Yang, *Religion in China: Survival and Revival Under Communist Ru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65-78.

² Fuk-tsang Ying, "The CPC's Policy on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1949-1957: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3:89 (March 2014), pp. 884-901.

³ 中共建國初期基督教的情況，參邢福增，《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增訂版）》（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有限公司，2012）。

⁴ 趙天恩、楊維美編，《赤地之穗：來自中國大陸的見證》（臺北：中國福音會出版社，1996）；福音證主協會中國研究中心編：《忠心的門徒》（香港：福音證主協會，1979）。*Households of God on China's Soil*, comp.; trans. Raymond Fung (Geneva: WCC, 1982).

近年，高晨揚研究文革期間「靈恩式基督教」（Pentecostal-style Protestantism）的發展，⁵重新喚起學術界對這段革命年代的宗教及靈性關注。重探文革時期中國基督教的發展，不論在文革史或中國基督教領域，均具重大意義。

（二）研究文本與方法

近年來，通俗史學（popular history）或大眾史學（public history）的重要性愈益受學術界重視，這些看似零散的民間史料，如私人日記、書信、札記及口述歷史等，對於重建歷史具有重大史料價值，有待發掘、整理及研究。⁶本文嘗試以一批極具研究價值、卻未為學者使用的民間史料為主，來重探文革期間中國基督教的面貌。研究文本是來自中國草根階層的信函，收信者為香港的遠東福音廣播公司（Far East Broadcasting Co., 下文簡稱遠東廣播）。1949 年以降，遠東廣播積極向共產中國進行宗教廣播。自 1958 年至 2004 年間，累積收到來自中國近 30 多萬名聽眾的來信。本研究獲得遠東廣播的支持，接收這批信件，進行整理與研究。有關信件反映了 1958 年大躍進以降，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尋道者及基督徒的面貌，同時亦呈現了文革後以至 1978 年間中國基督教的發展。誠然，信函內容以分散及零星的方式呈現，但通過量化（quantitative）的統計整理，以及質化（qualitative）的文本分析，實有助於研究者全面檢視此批珍貴的民間史料。來自中國各地的聽眾，分屬社會不同階層，通過書信述說他們的故事，由是併合成一幅中國社會和教會的集體圖像。全面整理及分析這批文獻，對我們從民間社會的角度來認識中國基督教的發展，有莫大裨益。

⁵ Chen-Yang Ka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Pentecostal-style Protestantism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Religion*, 24:2 (May 2009), pp. 171-188.

⁶ Barbara J. Howe & Emory L. Kemp eds., *Public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Malabar, Fla.: R. E. Krieger Pub. Co., 1988). 另參 Sebastian Veg, ed., *Popular Memories of the Mao Era: From Critical Debate to Reassessing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筆者曾撰文探討 1959 年起至文革初期的中國聽眾來信，⁷本文則以 1966 年至 1978 年間的書信為基礎，旨在揭示書信所見文革時期中國基督教的情況。基本上，本文遵循有關文革時段的界定（1966-1976），但將文革結束至改革開放前的兩年一併納入研究。因為 1977 年至 1978 年間，雖然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倒臺，但中國仍處於「左」思潮陰霾，尚未確定新的路向，直至 1978 年底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始邁進官方形容的改革開放新時期。

（三）第二社會

馮客（Frank Dikötter）研究文革史時指出，文革期間那些對共產主義教條產生懷疑者，正慢慢浮現了「第二社會」（second society）的民間力量。⁸第二社會的概念，最早由匈牙利社會學者漢吉斯（Elemér Hankiss）提出，用於探討東歐共產社會（匈牙利）在 1960-1980 年代間的變遷及轉型。根據漢氏的概念，第二社會存在於威權的「第一社會」（first society）之中，表現出分化（相對於同質）、橫向組織（相對於垂直組織）、另類意識形態（相對於官方意識形態）等取向。第二社會孕育了抵制官方主導文化的「第二文化」（second culture），而宗教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⁹

學者嘗試將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社會變遷，視作類似第二社會的出現。¹⁰不過，馮客的研究正好指出，文革期間不少人在表面上接受了黨的意識形態及教導，同時卻陽奉陰違地在另一世界中保存著「自由」的範圍，而地下宗教正是

⁷ Fuk-tsang Ying, "Voices from the Bamboo Curtain: A Study of the Audience Response to the Christian Broadcasting in Maoist China (1959-1968)," in Philip L. Wickeri, ed., *Unfinished History: Christianity and the Cold War in East Asia* (Leipzig: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2016), pp. 111-131.

⁸ Frank Diköt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People's History, 1962-1976* (New York; London: Bloomsbury Press, 2016), Ch. 22; Frank Dikötter, "The Second Society," in Sebastian Veg, ed., *Popular Memories of the Mao Era: From Critical Debate to Reassessing History*, pp. 183-198.

⁹ Elemér Hankiss, "The 'Second Society': Is There an Alternative Social Model Emerging in Contemporary Hungary?" *Social Research*, 55:1-2 (Spring/Summer 1988), pp. 13-42.

¹⁰ X. L. Ding, *The Decline of Communism in China: Legitimacy Crisis, 1977-19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0-31.

中國第二社會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¹¹本文借用了第二社會的概念，藉著中國民眾來信，立體地將這個第二社會的情況呈現出來，其中包括秘密維持宗教信仰的基督徒，也涉及在此年代藉宗教廣播追求另類精神的尋道者。福音廣播聽眾的信函，成為建構文革時代中國第二社會的重要素材。

本文先探討冷戰氛圍下，香港的宗教電臺對共產中國進行廣播背後所反映的意識形態，以及中共及民間對「敵臺」的回應。接下來以 1966 年至 1978 年中國聽眾來信為中心，探究其中所見的民間思想，並藉分析聽眾信函中所留下來的「未聽見的聲音」，重構文革期間第二社會所呈現的中國社會及基督教發展的獨特圖像。

二、穿透鐵幕的敵臺廣播：挑戰與回應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一百多年來歐美在華傳教運動的落幕。中國教會遭遇歷次政治運動衝擊，在嚴峻環境下如何生存及發展？除了關注中國本土教會的演變與發展外，其實來自境外的宗教廣播，藉獨特的方式穿透鐵幕，也參與了中國基督教的發展。福音廣播在冷戰氛圍下扮演的重要角色，一直為當代中國研究及基督教研究學者所忽視。中國官方批評此等境外廣播為「反共反華」的敵對勢力，但來自民間的聽眾如何看待與回應宗教廣播，在反映出高度政治化社會下，中國草根階層的另類聲音。

（一）冷戰氛圍中的宗教廣播

遠東福音廣播公司成立於 1945 年，並於 1948 年 6 月 4 日在馬尼拉啓播。1949 年 7 月 29 日，位於馬尼拉的遠東電臺首次以短波向中國廣播，對華福音廣播事工於焉開始。馬尼拉電臺每星期以三種中國方言進行 13 小時的廣播，主要由當地華人牧者及信徒負責。1949 年至 1951 年間，遠東廣播仍收到來自中國不同地方的聽眾的來信。部分自中國撤離的外國傳教士亦證實，不少信徒

¹¹ Frank Diköt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People's History, 1962-1976*, pp. 285-286.

仍能收聽福音廣播。¹²在 1952 年 5 月號的英文《遠東廣播》刊物上，如此形容：「我們深深感到扛在我們肩上的的是何等沉重的責任，我們是唯一可以從外面召喚中國人歸向基督的聲音。……馬尼拉一群忠心的華人信徒和牧者，還有一些宣教士參與製作節目，並加上其他的優良節目供應組合成為遠東關懷中國的廣播。」¹³

1958 年 9 月，遠東廣播香港錄音室正式成立，並附設研究中心，搜集有關中國的資料，幫助節目製作者更了解聽眾的需要。¹⁴自 1958 年起，香港遠東廣播陸續收到來自中國聽眾的信函。在 1950 年代後期極「左」宗教政策下，中國教會受到政治運動的沉重打擊，宗教訊息透過大氣電波，成為動盪時局下不少人心靈的安慰與力量。

毋庸置疑，在冷戰氛圍下，對共產國家的宗教廣播也具有抗衡共產主義的考量。事實上，宗教廣播一直是西方自由民主國家企圖突破共產鐵幕的途徑之一。¹⁵遠東廣播在 1968 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指出，自中共建國後，傳教士已無法進入中國。但藉著宗教廣播，「基督並沒有輸掉戰鬥」（“Christ has not lost the battle.”）。¹⁶即或在文革期間，福音廣播仍是穿透鐵幕的重要工具。¹⁷遠東

¹² 羅伯·鮑曼 (Robert Bowman) 著，劉建慰譯，《行奇事的神——遠東廣播公司創辦人鮑曼的故事》(台北：天恩出版社，2006)，頁 xx；另見鮑曼，〈中國福音廣播的歲月〉，《遠東廣播》，卷 33 期 3 (1998 年 5-6 月)，頁 15。鮑曼並沒有具體指出三種中國方言，筆者估計，應為國語、粵語、閩南語。

¹³ 轉引自鮑曼，〈中國福音廣播的歲月〉，《遠東廣播》，卷 33 期 3，頁 16。

¹⁴ 鮑曼，〈中國福音廣播的歲月〉，《遠東廣播》，卷 33 期 3，頁 16。

¹⁵ Nancy L. Street & Marilyn J. Matelski, *Message from the Underground: Transnational Radio in Resistance and in Solidarity* (Westport, CT: Praeger, 1997). Richard H. Cummings, *Cold War Radio: The Dangerous History of American Broadcasting in Europe, 1950-1989*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and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2009), Richard H. Cummings, *Radio Free Europe's "Crusade for Freedom": Rallying Americans Behind Cold War Broadcasting*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and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2010). K. R. M. Short, ed., *Western Broadcasting over the Iron Curtain* (NY: St. Martin's Press, 1986).

¹⁶ Gleason H. Ledyard, *Sky Waves: The Incredible 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 Story* (Chicago: Moody Press, 1968), p. 182.

¹⁷ Eleanor G. Bowman and Susan F. Titus, *Eyes Beyond the Horizon* (Nashville TN: Thomas Nelson, 1991), pp. 129-132.

廣播的創辦人鮑曼（Robert Bowman）在 1976 年接受訪問時，強調廣播工作的目的是要將福音及自由的信徒傳到共產地區。¹⁸

不過，遠東廣播一直以宗教與非政治的立場來為福音廣播定位。1970 年，鮑曼在一次內部主任會議中，說明遠東廣播對共產主義的態度，他強調，從神學上，由於共產主義否定上帝，必然與基督教對立。因此，只要正面地傳講福音，便是一種「反共」（anti-communist）的行為。但這並不代表政治上，基督徒成為「反共產主義者」（anti-communist people）。¹⁹儘管如此，中共對來自境外的宗教廣播，仍一律將之視為「敵臺」。²⁰

（二）披著宗教外衣的反共反華「敵臺」

中共建國後，加緊對社會各領域的控制。由於廣播事業在輿論宣傳及意識形態工作方面的戰略位置，自然成為新政權欲掌控的目標。以上海為例，中共很快便要求所有私營廣播電臺歇業，較具歷史的上海福音廣播電臺，也自 1951 年 1 月 24 日正式停止廣播。²¹

不過，中國政府眼中，仍有不少境外「敵臺」持續對華進行反共反華廣播，例如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 VOA）、英國廣播電臺（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臺灣自由中國之聲等。1967 年 1 月，中央對廣播事業局實行軍事管制，嚴格控制廣播的內容。²²針對境外電臺，中國政府將收聽「敵臺」視作嚴重的反革命罪行，輕者被沒收收音機、通報單位進行處分或辭退，

¹⁸ “FEBC Broadcasts Freedom Message,” April 1976. Billy Graham Centre Archives, 209: FEBC, Report, 1976.

¹⁹ “Minutes of Regular Meeting of Board of Directors,” May 23, 1970. Billy Graham Centre Archives, 209: FEBC, Reports and Minutes, 1970.

²⁰ Eleanor G. Bowman and Susan F. Titus, *Eyes Beyond the Horizon*, p.130.

²¹ 《上海宗教志》編纂委員會，《上海宗教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頁 519。據《上海廣播電視志》，停播日期為 1952 年 8 月；另參〈關於建立公私合營上海聯合廣播電臺的報告〉，收入《上海廣播電視志》編委會編，《上海廣播電視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頁 121、878-880。

²² 徐金洲，〈《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革軍管正確結論的再認識〉，《軍事歷史研究》，2012 年第 4 期，頁 91。吳劍麗，〈竹幕升起：從良友電臺內地聽眾來信（1959-1983）看大門重開前後的中國教會〉（香港：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碩士論文，2010）。

重者則被批鬥、判刑，甚至丟掉性命。雖然按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規定，只是「偶爾給敵臺寫信聯繫，情節輕微，確有悔改表現的；思想落後，向敵臺乞求物資的；給敵臺去信要求代尋親友的」，不應以反革命處理，但在實際操作上，仍出現「錯劃」的情況。²³除了上級檢查、鼓勵民眾相互揭發外，當局也藉無線電干擾等手段來防止民眾收聽外臺。事實上，有關禁止中國民眾收聽宗教廣播的禁令，一直到 1980 年代仍然維持。²⁴

福音廣播的內容雖不涉政治，但因其宗教色彩，也被認定為「敵臺」。1968 年，香港左派報章《大公報》批評遠東廣播為「披著宗教外衣的美國特務」所主辦的機構，「加緊利用香港進行反共反華的活動」。報導指所謂的「福音」，即是「反共反華的聲音，就是反革命的聲音」。有關「特務工作」包括：「搜集反共反華資料，製造各種反動的廣播節目，竊聽我祖國的廣播」，並且「明目張膽地利用電台和郵信進行特務聯絡活動，利用香港進行反共反華活動」。報導又批評香港殖民地政府對此種「罪惡活動」，竟「聽之由之，任其繼續」。²⁵1976 年 6 月，江西省公安局的報告中，亦點名遠東廣播，將其與美國之音、蘇修、台灣「蔣幫」等並列，「一天二十四小時不停地嚎叫」，把「反動廣播作為對我進行『心戰』破壞活動的重要武器」。²⁶即使到 1980 年代，福音廣播仍然被視作不友善的敵對行為。例如 1980 年 3 月，中共中央批示〈關於抵

²³ 與敵臺通信的行為也會被列入「與反革命行為掛鉤」的嫌疑。文革期間，上海共處理相關的反革命案件 4549 件。見《上海審判志》〔電子資源〕（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http://www.shtong.gov.cn/dfz_web/DFZ/Info?idnode=81388&tableName=userobject1a&id=101298
（2014 年 6 月 4 日檢索）。另一部文革期間的「知青」後來所寫的回憶錄式的小說《血色黃昏》中也有關於收聽敵臺作為反革命罪處理的記載。見老鬼，《血色黃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頁 154。

²⁴ 1988 年，國家宗教局下發了〈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公安部關於制止和處理利用基督教進行非法違法活動的通知〉，對憲法第三十六條做出特別規定，其中強調「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組織收聽、錄制轉播海外『福音』廣播，不得轉運、散發非法入境的宗教書刊、宗教宣傳品」。羅廣武編著，《新中國宗教工作大事概覽（1949-1999）》（北京：華文出版社，2001），頁 392。

²⁵ 〈美特加緊利用香港，進行反共反華活動〉，《大公報》，1968 年 10 月 7 日，第 4 版。

²⁶ 〈江西省公安局關於當前帝修反和蔣幫對我進行破壞活動的主要情況的通報〉（1976 年 6 月 30 日），贛公政字 027 號，收入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6）。

制外國教會對我進行宗教滲透問題的請示報告〉，指出宗教廣播一直從未停止，導致青年人聽後信教。²⁷12月，中國基督教愛國宗教組織的領袖丁光訓主教，在跟香港教會人士會面時不諱言地指出，通過廣播向中國傳教的活動，是極「敏感」的問題，乃不尊重及不友善的表現。²⁸1984年，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任務之在北京接見香港基督教訪問團時，仍將境外對華廣播視為「敵視性的廣播」，指某些「宗教廣播中，加些政治內容」。²⁹福音廣播背後的「反共」性質，以及香港作為對華宗教廣播的基地，一直受到中方的關注。³⁰

（三）在全能政治夾縫中的偷聽者

文革期間，舉國上下均宣傳消滅宗教的政策，而收聽境外「敵臺」廣播更被視為嚴重罪行，甚至是「反革命罪」。³¹不過，中國聽眾的來信反映出，仍然有人冒險收聽宗教廣播，甚至寫信到香港的遠東廣播。不過，寄信人在信中註明信封的地址是假的，擔心被保安機關查出「裡通國外」的罪名。³²又有人再三要求電臺小心保密：

我對你的來信是〔到〕極秘密地方去寫的，因此要求你能同我的通信保存好。特別是我的地址與姓名，萬一給我上級知道則不是一件好事。因此我十分怕周圍人追究起通信來。³³

²⁷ 〈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關於抵制外國教會對我進行宗教滲透問題的請示報告」〉（1980年3月4日），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務局編印，《宗教政策文件匯編》（內部文件，1988），頁14。

²⁸ 〈十四點看法：丁光訓主教一九八〇十二月二十三日同香港丘恩處牧師、吳建增牧師談話記錄〉，《信息》，1981年3月，頁3。

²⁹ 〈宗教事務局任務之代局長有關宗教問題的談話撮要〉，《信息》，1984年9月，頁5。

³⁰ 吳木，〈關於基督教的福音廣播〉，《當代宗教研究》，1993年第1期，頁44-47。文末指：「如果福音廣播背後的巨大陰影仍然把基督教同共產主義視作生死對立的兩極，那麼我們的耳邊響起那磁性般充滿溫情的聲音：『耶穌基督的福音』的時候，我們仍然還是要警惕那些中傷、嘲諷、煽動以及用意叵測的冷箭。」

³¹ 〈我收聽了良友電臺〉，《福音廣播》，卷12期1（1977年2月），頁3。

³² 信件編號：19680915-M0508，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檔案室藏，《香港遠東廣播讀者來信檔》，1966-1978。

³³ 信件編號：19660205-M0036。

即便是在相對開放的廣州，投信者也並非毫無顧忌。有人使用假的名字和地址與電臺通信：「信封面的地址是假的」，³⁴「……十分希望與您交通，於是便藉在港一位不大熟識的表姨媽、因怕她對我生疑就用了媽媽的姓名□□把信轉交給您。」³⁵因為曾經出於安全考慮而使用假名與電臺通信，有的聽眾還感到不安：「梁友兄，相信您已經意識到，我由於種種原因，不能不使用別名與您通信，然而現在，我應當誠實的告訴您，否則，欺騙將是一種罪過。但是，在一般情況下您來信不必使用這個名字。」³⁶

還有的因為通信而被懷疑：「上面知道加以收到福音（單張）多張，引起他們的知道，以為我們收聽敵人的誘惑，有同敵聯繫……因這裡對信仰很嚴緊，唱聖歌就會受批，如果對人傳福音就會受處分……過密有信難免疑惑，不要過密就可以。」³⁷

另一位於 1975 年偷渡來港的廣東信徒說：

在大陸買一部收音機不過三幾十元，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但有了收音機，卻會為你帶來一些麻煩。從政治立場上說，政府不准人民收聽國外電臺，特別是敵對的反動電臺。如果你出身不好，社會關係複雜，有收音機，常會受人注意，懷疑你收聽外臺。在 XX 地區來說，一般出身好的，即工人、貧下中農、幹部、黨員、團員都會有收音機，而且他們更會大膽收聽外臺。³⁸

抑有進者，部分人士甚至冒更大風險，寫信到香港與遠東廣播聯絡。事實上，投信者內心也恐懼會遭遇不測，例如有人說：「這封信是否能一路平安的毫無障礙的到達你的手中？萬一被保安機關查出，『裡通國外』這個罪名真擔當不起啊！」³⁹「也許因某種緣故，因這信而使我忍受不幸的意外，但上帝是會保

³⁴ 信件編號：19680915-M0508。

³⁵ 信件編號：19750627-M0014。為保障私隱，有關名字經處理。

³⁶ 信件編號：19680623-M0288。「梁友」即「良友電臺」。

³⁷ 信件編號：19760927-M0012。

³⁸ 〈大陸聽眾與福音廣播〉，《福音廣播》，卷 10 期 6（1975 年 12 月），頁 9。原文地區經匿名處理。

³⁹ 信件編號：19680915-M0508。

佑我的。」⁴⁰但即或寫信具有高度風險，卻沒有阻擋他們與電臺通信的熱情，因為這些信常常成爲他們在最艱難黑暗的境況中的精神支持和鼓勵。考慮到寄信人的安全，美國遠東廣播總部曾規定，不會回覆來自中國的來信。⁴¹不過，文革期間的來信內容中，多次提及收到遠東廣播節目主持人的來信，⁴²更有提及收到海關沒收物件的通知單，指從香港寄來的聖經被當局沒收，⁴³證實有關規定並沒有嚴格地執行。

馮客在其文革史研究中，便指各地都有人冒著被鄰居檢舉，被判反革命罪的危險，偷聽外國電臺廣播。⁴⁴這些人敢於犯險，甚至寫信到香港，確實是個不容忽視的社會現象，反映出在「全能主義」（Totalism）政治下，民眾的另類抵制與反抗。

三、中國聽眾來信所見文革期間的社會與基督教

中國聽眾來信雖然零星分散，但我們仍可通過量化的方式，呈現來信者的動機及地域分布，作爲重探文革期間中國社會與基督教關係的基礎。同時，也藉著信徒的發聲，立體地呈現了在消滅宗教政策下中國信徒的遭遇。

（一）中國聽眾來信（1966-1978）：基本統計

從 1966 年文革全面爆發開始，直到 1978 年底改革開放政策施行以來的十三年間，香港遠東廣播共收到中國聽眾來信 267 封。現存的信件有 252 封，來自一百多位中國聽眾。⁴⁵

⁴⁰ 信件編號：19680424-M0158。

⁴¹ Gleason H. Ledyard, *Sky Waves: The Incredible 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 Story*, pp. 190-191.

⁴² 如信件編號：19620324-M0022、19730829-M0043、19730024-M000073、19731213-M0103、19740209-M0024、19740315-M0074、19740503-M0134 等。

⁴³ 「自香港寄給你的物品，經我關驗查，內有聖經（馬太福音）壹本。因對我國政治、經濟、文化、道德有害，按照規定，予以沒收。」信件編號：19740209-M0024。

⁴⁴ Frank Diköt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People's History, 1962-1976*, pp. 291-292.

⁴⁵ 1968 年、1976 年和 1978 年的現存信件數量多於來信數量，是由於計算方法不同的原因。電臺將同一來信者來信日期相近的不同信件標記在統一編號下，由此「來信數量」比實際信件數量爲少。另部分散佚的信件可以在《福音廣播》雙月刊中找到摘錄的片段。

表 1 來信數量統計概況（1966-1978）

| 年份 | 中國聽眾 來信數量 | 現存原件數量 | 寄信人數 | 《福音廣播》雙月刊 摘錄信件數量 |
|------|--------------|--------|------|---------------------|
| 1966 | 21 | 21 | 11 | - |
| 1967 | 18 | 12 | 12 | - |
| 1968 | 52 | 59 | 18 | - |
| 1969 | 9 | 0 | - | - |
| 1970 | 7 | 0 | - | - |
| 1971 | 2 | 0 | - | 1 |
| 1972 | 0 | 0 | - | 0 |
| 1973 | 13 | 13 | 9 | 2 |
| 1974 | 36 | 36 | 16 | 17 |
| 1975 | 20 | 20 | 10 | 10 |
| 1976 | 16 | 17 | 11 | 4 |
| 1977 | 21 | 21 | 12 | 11 |
| 1978 | 52 | 53 | 30 | 29 |
| 總數 | 267 | 252 | 129 | 7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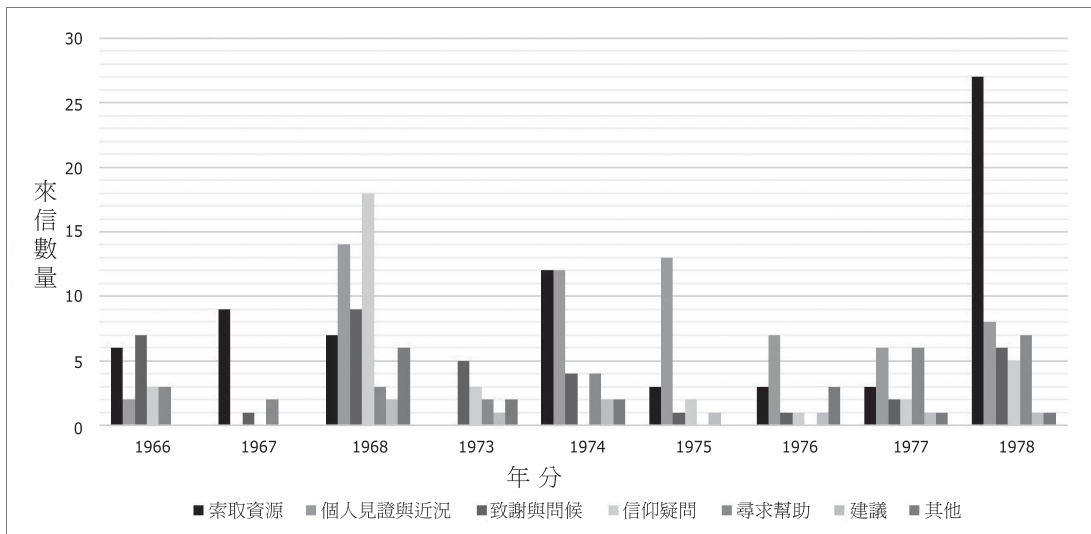
表 1 是關於歷年來信數量情況的統計。來信數量的兩個高峰，分別出現在 1968 年和 1978 年（各 52 封），1969 年起數量驟減，1972 年甚至沒有收到任何來信。若按照文革前期（1966-1968）、中期（1968-1971）、後期（1971-1976）及文革以後（1977-1978）的劃分，則文革前期來信數量為多（91 封），後期次之（85 封），中期最少（18 封）。文革結束至改革開放階段的短短兩年，便有 73 封來信，也預示著中國進入新時代的序幕。⁴⁶因此，聽眾來信的數量，也體現了時局的動盪程度以及政權控制的嚴格程度。1979 年，來自中國的信函躍增至 10,781 封，即充分反映中國民間社會面對改革開放時所呈現的活力。

⁴⁶ 關於文革的分期，主要參考馮客著作。另按中共的分期：第一階段是 1966 年 5 月到 1969 年 4 月，第二階段是 1969 年 4 月到 1973 年 8 月，第三階段是 1973 年 8 月到 1976 年 10 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註釋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 30-34。

文革時期，為何中國聽眾敢於冒險收聽「敵臺」，甚至寫信到香港？他們來信目的是甚麼？我們整理信件的內容，歸納為七個類別：「索取資源」（28%）、「個人見證與近況」（24%）、「信仰疑問」（13%）、「尋求幫助」（11%）、「致謝與問候」（14%）、「其他」（6%）以及「建議」（4%）。⁴⁷可見聽眾來信比例最多的內容是向電臺索取各種資源，包括聖經、詩歌、英語教材和基督教日曆等等；其次則是個人見證或近況的分享。

不過，圖 1 檢視各年信件，則呈現不同的比例：其中索取資源者較明顯集中在 1978 年。這反映出在文革結束後略呈寬鬆的環境中，聽眾向外間索取資料的強烈需求。

圖 1 各年信件內容分類（1966-1978）



⁴⁷ 個別信中可能同時包含多個目的，但為了更直觀地瞭解各年信件的匯總情況，本文選取各信件中的主要目的將信件歸類整理。

（二）紅色中國的區域差異

由於中國地域廣闊，區域差異一直是中國研究的重要課題。遠東廣播除了國語外，也針對不同地區開辦不同方言（如粵語、閩南語）的節目，面向全國不同地域的聽眾。那麼，文革時期中國民眾來信所呈現的區域分布情況，究竟如何？

整理有關來信可見，廣東省是全國來信數量最多的省分，佔 78%（179 封）；福建次之（13%，30 封），其他省分爲 9%（43 封）。⁴⁸影響各省來信數量差異的因素涉及兩方面：首先是收聽廣播的情況——廣播接收的信號是否良好、對收聽廣播的控制是否嚴格；其次是郵路是否通暢——聽眾發出的信件是否能送出，電臺寄來的信能否送到收信人手上，亦影響不同省分聽眾的來信數量。⁴⁹

相對內陸城市，東南沿海城市較易與外界接觸，例如廣東省和福建省，在地理上具有接近境外的便利條件。很多親友在香港或國外，對這些聽眾來說，與外界通信並不會引起相關部門太大注意。再者，他們還可以通過香港親友與電臺聯繫。⁵⁰

此外，文革期間政府對郵路的控制也因地而異，對待信件的态度各不相同。有的地方會對信件進行檢查，發現可疑的信件，輕則直接「處理」掉，嚴重的可能追究責任。從不少聽眾和電臺的通信中，均發現有信件寄失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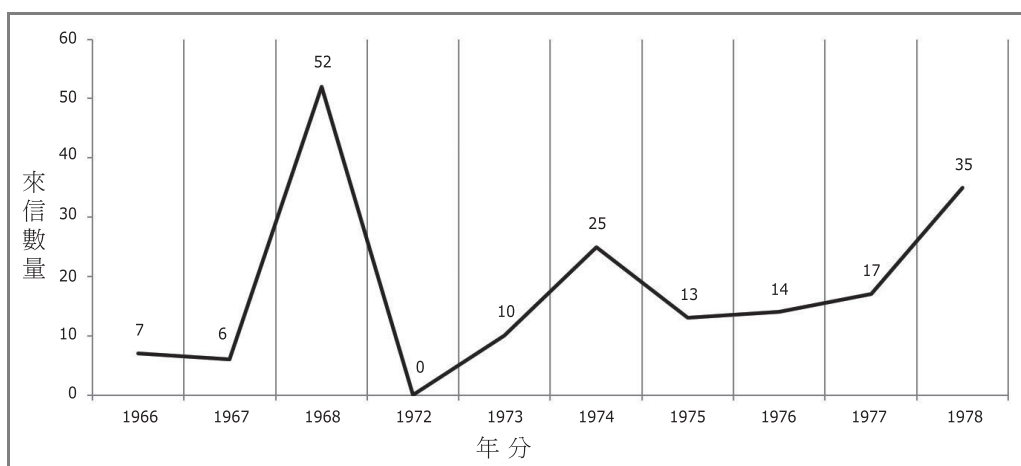
以來信最多的廣東省爲例，圖 2 是歷年聽眾來信情況。

⁴⁸ 其他省市包括：江蘇（6 封）、雲南（4 封）、北京（2 封）、上海（2 封）、陝西（1 封）、廣西（1 封）、遼寧（1 封）、河南（1 封）、河北（1 封）、浙江（1 封）及不詳（23 封）。

⁴⁹ 文革前 1950-1960 年代的聽眾來信亦呈現這一地域特點：廣東省的來信數量最多，福建次之，影響因素也相類似。參 Fuk-tsang Ying, “Voices from the Bamboo Curtain: A Study of the Audience Response to the Christian Broadcasting in Maoist China (1959-1968),” in *Unfinished History: Christianity and the Cold War in East Asia*, pp. 119-120.

⁵⁰ “China Letters Responses Breakdown,” *FEBC International Chinese Program Consultant Report #2* (April, 1980), p.7.

圖 2 廣東省聽眾來信統計 (1966-1978)



廣東省聽眾來信在 1968 年和 1978 年出現了明顯的高峰，而在 1972 年則沒有收信紀錄。1968 年的來信中，信仰疑問和個人情況的分享佔大多數（圖 1），這或與當時廣東的動盪局勢不無關係。1967 年至 1968 年正值文革發展極為混亂之時，1967 年廣東多地發生大規模派系武鬥，流血事件時有所聞。⁵¹不少聽眾在來信中表達了對此的擔憂，也有人選擇離開當地。一封來自東莞的信裡說：「去年七八月，廣州發生武鬥，遂返鄉間避亂」，⁵²還有的人想要偷渡出境，一位廣東的弟兄來信說：「這裡各地有動戈動槍的事件……苦難深重，大有受法老欺壓的感受。於是同情一些弟兄過紅海的正當要求的，請紀念這一

⁵¹ 1967 年 7 月 23 日，「東風派」和「紅旗派」兩派群眾在中山紀念堂一帶發生武鬥，共聚集兩萬餘人，軍管會抽調 21 個連（約 2,500 人）的解放軍赴現場維持秩序；同年 8 月兩大派在省工會大樓發生武鬥，槍戰達四個小時。見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廣東歷史大事記（1949.10-2004.9）》（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頁 218。蘇陽在研究文革期間的集體殺戮時，也指出廣東及廣西是兩個最暴戾的省分。參蘇陽著，宋熙譯，《文革期間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頁 51-53。

⁵² 信件編號：19680202-M0108。

件事，尚有家人從這裡去求救助，請助一臂之力。」⁵³這位弟兄一直嘗試「出埃及」（偷渡出國），但計畫失敗，因此受到逼迫。⁵⁴

局勢的混亂除了導致人人自危，也引發一些基督徒對信仰的關注和反思，有一封廣東信件說：「近日來我的心情沉悶極了，因為我看到在此處的河石上，間斷地漂來了數十具屍體，據稱是由廣西流下來的，這些被魔鬼捉弄而喪失生命的可憐的老少婦孺，將是永遠沉淪了。有什麼辦法呢，唯有禱告於上帝，願他們得到安息吧。」⁵⁵這位聽眾認為：「惡劣的環境、艱苦的歲月、坎坷的路途，是主耶穌對我們的試煉，使我們的信心和意志受到更大的考驗。」⁵⁶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革時期不少基督徒對苦難的理解，在備受壓制和人性扭曲的環境中，爆發出更強的反抗意志和韌性。這也可以解釋，即使在文革期間的嚴峻政治環境下，為什麼仍有兩百多封信，歷經曲折旅途，從全國各地送達香港。

（三）消滅宗教政策下的基督徒

在消滅宗教的高壓政策下，文革期間公開聚會已無可能。來信中多提及教會遭到關閉的情況。有來信指出：「我們這裡不準〔准〕傳揚神的福音，禮拜堂已經取消，所以實在無辦法。惟有倚賴我們無所不知的神，就能我救。」⁵⁷

另有廣州聽眾記述了教會和信徒：「在未有文化大革命以前，我都小久〔從小就〕到基督教堂聽過經，說的都是雷鋒等等，這個運動後，廣州所有的教堂以及石室⁵⁸都查封了，石室裡的神甫等十幾人都被捉起來刮光頭，並捉他們遊街示眾，在石室上有一大對聯是寫要『吊死上帝』幾個大字，所以我是聽不到都〔讀〕聖經的。就是說不能讓聖靈照耀我，我渴望能懂得這方面的真理，我又羨慕你們能經常讀經。」⁵⁹

⁵³ 信件編號：19680130-M0098。

⁵⁴ 信件編號：19680717-M0308。

⁵⁵ 信件編號：19680531-M0198。

⁵⁶ 信件編號：19680531-M0198。

⁵⁷ 信件編號：19731129-M0093。

⁵⁸ 石室聖心大教堂，是廣州最大的天主教堂。

⁵⁹ 信件編號：19680119-M0216。

在 1982 年的來信中，來自上海的聽眾回憶自己在文革時期因信仰受逼迫的情況：

我在 1966 年 9 月 6 日文化大革命初期，遭抄家，要我放棄信仰，被我堅拒，強行抄去聖經、詩歌、啟示錄講義、單張……並連生活必需用品也被抄去，並組織圍攻以扛抬方式給我遊行二次□，次日連我老母親也被拉出去，令我戴帽子，以卑鄙捏造□忌妄誣來取逼供審連續達壹星期之久後，並給封門達三個半□之久，致使我母親（在當時已八十三歲）受驚不起病倒致死（詳擬將後憶寫）……在封門和我因病被送到市一醫院急診觀察室期間，我呼求主訴苦，已久病仰癱不起，母親又病在醫院，而室內僅我孤居於室內，如果不相信主，我何必要病癱於世，本可用手插入床旁的插橫電路中，但想到尋死不能得救，故堅持忍受，思念老母親昏睡在醫院……之情，但我在仰癱床上仰視中忽見離床三四公尺上方又見光組成十字架，促使我又想起在 1943 年秋在真神堂聚會時所見的光組成十字架並所聽到的隱有聲音：「對著十字架跑」……⁶⁰

很多人因為教會關閉，便沒有地方可參與宗教聚會，如一位印尼華僑自回國後就沒有再參加聚會。不論在城市或農村，開始有信徒在家中舉行聚會。文革後期的 1970 年代，福建省的聽眾多提到家中的聚會：

此間城市信主，逢星期日具有偷聚會作主日崇拜（在信徒家中）……每星期日則公開在一華僑家作主日崇拜，參加甚多。⁶¹

我們這裡有少數弟兄姐妹於禮拜日在兄弟家中聚集敬拜主。因主說兩三個人同心在臉面所求，他必應許！……求主使我們聖殿早日大開恩門，使兄弟姊妹每逢主日可以安息在裡面聽主的福音，使我們處處可以稱謝主，讚美主……⁶²

⁶⁰ 信件編號：19820531-M4407。因字體關係，個別用字未能辨認。

⁶¹ 信件編號：19760128-M0128。

⁶² 信件編號：19781012-M0020。

更多的人沒有聚會的機會，便藉助收聽電臺來幫助自己在信仰上有所堅持和進步，他們對信仰的疑問也藉助與電臺的通信來解答。

從來信中可見，文革期間由於公開的教會悉被關閉，地下教會反倒因其隱蔽性和自發性而獲得生機。由於原有的愛國基督教團體，及管控宗教的統戰部及宗教局在文革時也受衝擊，地下教會反而得以發展壯大。

一位廣州信徒的來信指出，文革前的三自教會，已經流露為政治服務的痕跡（「講的都是雷鋒」），而在 1958 年的「教會大聯合」中，全國各地不少教會被關閉，只留下少數教堂做聯合禮拜之用。⁶³但文革期間，僅餘的三自教堂也關閉了，三自組織悉被解散、牧職人員盡遭迫害。⁶⁴中共原本以「消滅宗教」為目標，希望「加速宗教的滅亡」，⁶⁵不料宗教活動轉入地下，形成變相的「反抗」，令中共更加難以控制和管理。

1982 年，中共中央發表關於宗教信仰的綱領性文件〈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十九號文件」）中，也承認這種地下宗教的存在：

自一九五七年以後……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在宗教問題上使用暴力，結果卻使宗教活動在秘密和分散的狀態下得到某些發展，少數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則利用這種條件，在宗教活動掩蓋下大搞違法犯罪活動和反革命破壞活動。⁶⁶

家庭聚會的情況則因地而異，城市裡或許有受訓的信徒領袖負責帶領，但在農村便較困難。在這種情況下，福音廣播不受地域限制，在傳播福音和栽培

⁶³ 趙天恩、莊婉芳，《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臺北：中國福音會出版有限公司，1997），頁 188。

⁶⁴ Richard C. Bush, *Religion in Communist China*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70), pp. 254-263.

⁶⁵ 1972 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一本名為《袖珍神學》的小書，署名作者霍爾巴赫（Baron d'Holbach）為「十八世紀一位法國唯物主義無神論者」，強調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時，宗教根源才會消滅，宗教自會消失。見趙天恩、莊婉芳，《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頁 223。

⁶⁶ 〈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1982 年 3 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綜合研究組、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規司編，《新時期宗教工作文獻選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頁 57-58。

信徒方面便極為便利，在以消滅宗教為政策的時代下，成為宗教信仰得以流傳的獨特管道。

文革期間，基督教遭到前所未有的政治打擊，卻改變了基督教在中國的生存面貌和格局。教會轉入地下的發展形態持續了十年之久，使地下教會的根基漸漸穩固。文革後，官方三自教會和不獲官方認可的家庭教會兩者形成的並存格局，其歷史根源當可追溯於此。

（四）文革時期的聖經

在此，順帶提及文革時期聖經的遭遇。隨著消滅宗教政策的執行，紅衛兵在抄家時，也將聖經視作「毒素」，必須火燒或上繳，不得私自留下；他們恣意焚燒教堂內的聖經、讚美詩、宗教書刊，或送到造紙廠打漿化掉。⁶⁷

同時，中國已經沒有生產、印刷、發行聖經的機構。在嚴格控制下，聖經成為中國基督徒的「奢侈品」，許多信徒「連一本聖經也沒有」。一位廣州的聽眾來信說：「惟自文化大革命後，教堂盡遭封閉，新約亦已成灰。」⁶⁸缺乏聖經自然影響到信徒們對信仰的瞭解：「至於 Holy Bible 裡的銘句，我都不懂，自〔19〕64 年後，在此的弟兄姐妹都沒有得看了，大部分已被燒了。這是遺憾的，你說是嗎？」⁶⁹

在這種情況下，基督徒不得不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在一些偷偷聚會的地方，大家把現有的聖經拆成一卷一卷，相互傳抄：「通常聖經都是不完整的。它被撕開，分散給各弟兄姐妹用手抄錄。我所擁有的一本是由一位很年老的姊妹抄下來送給我的。我流著眼淚接受，並真正地讀它。」⁷⁰

遠東廣播一度應中國聽眾要求，郵寄聖經到中國，但在國門緊鎖的年代，聖經很難通過海關的審查。因此後來電臺便在節目中以慢速誦讀聖經，供聽眾默寫。雖然這種方法存在一定局限，例如有些聽眾文化水平不高、不能書寫，

⁶⁷ 趙天恩、莊婉芳，《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 1949-1997》，頁 188。

⁶⁸ 信件編號 19680202-M0108。

⁶⁹ 信件編號 19680511-M0168。

⁷⁰ 〈廣東省寧弟兄訪問〉，遠東廣播香港錄音室訪問紀錄（1972 年 5 月 1 日）。

或者有時因為收聽不清楚或語速太快而無法記下，以及難免出現錯誤等，但仍然能解決一部分人因缺乏聖經而帶來的信仰困境。⁷¹

四、第二社會的「聲音」

上文整理及分析了中國收聽民眾來信的動機及地域分布，接下來，我們再以來信者為主體，可見冒著極大政治風險收聽宗教廣播者，不僅是基督徒，也包括非基督徒。通過質化的整理，嘗試將第二社會的聲音呈現出來。

（一）誰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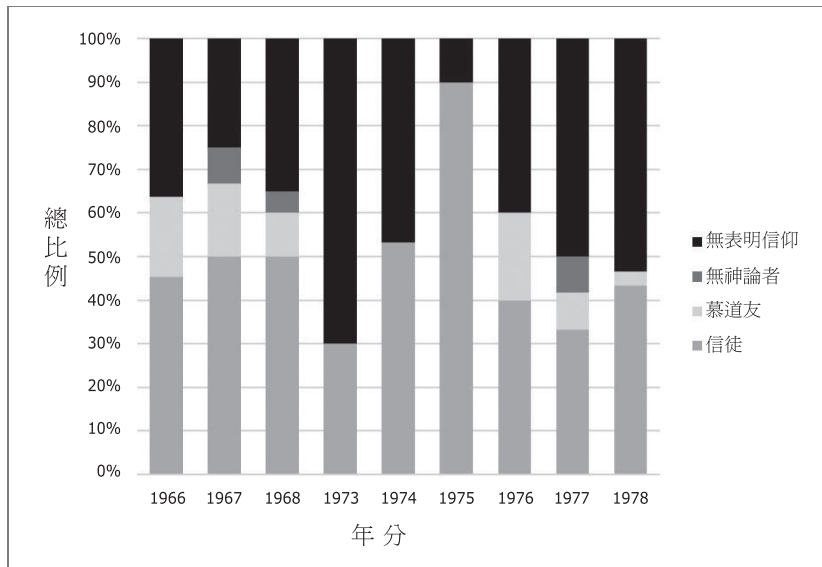
文革期間，中國聽眾群體頗為多樣化。既有基督徒，也有尋道者，甚至還有無神論者。作為以宗教內容為主的廣播，能吸引非信徒群體的關注是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在文革期間，這種情況更值得關注。

關於中國聽眾來信者的背景，按其信仰狀況可分為四類：信徒（48%，62 封）、慕道友（8%，10 封）、無神論者（2%，3 封）和無表明信仰（42%，55 封）。其中「無神論者」是在信中明確表明自己無宗教信仰的聽眾，而「無表明信仰」的聽眾是指信件中不涉及任何信仰內容，但從內容及用詞推論，絕大多數應是非基督徒。

圖 3 以各年的情況作統計。撇除 1969 年至 1972 年資料不全，值得注意的是：（一）除 1973 年，1976 年至 1978 年外，信徒聽眾均佔穩定比例，反映信徒仍是福音廣播的主要聽眾。（二）至於明確表明為非信徒者，包括自稱無神論者，或是因收聽福音廣播而成為信仰的追求者，比例雖不算高，但仍反映出福音廣播的吸引力。（三）雖然近 42% 的聽眾未能在信件中判斷其身分，但收聽及寫信予「敵臺」之舉動，多少仍反映出他們對現存體制的不滿，期望藉由廣播獲取宗教、精神以及物質上的支援。

⁷¹ 一位廣東的李弟兄曾致信電臺，表示希望讀聖經的語速慢一些，講明章節和標點符號以及特別說明地名、人名、同音字等。信件編號：19681215-M0488。

圖 3 歷年來信者信仰狀況統計（1966-1978）



（二）基督徒的聲音

文革期間，中國基督徒透過信函，表達出怎樣的思想訴求？首先，不少基督徒寫信是爲了尋求信仰疑問的解答。例如一位印尼歸國的華僑在信中說：「我在 1966 年已經受洗禮爲基督教徒 protestan[t]，但是離開印度尼西亞之後就不去教堂做禮拜了，這裡的教堂沒有開了。所以請問，是否耶蘇〔穌〕基督〔會〕離開我呢？上述的問題我總是害怕的，因爲在今日的生活環境中使我經常犯罪」，⁷²「今日的生活環境」是否是對文革中的生活特有所指？我們不得而知，但這種描述確實是很多基督徒面臨的實存問題。一方面他們被褫奪了公開崇拜的權利，另一方面又要刻意隱藏自己的信仰，此舉確實令不少信徒感到疑惑和不安。

⁷² 信件編號：19680123-M0068。

有一位廣州的占姐妹在 1968 年一年內，曾 11 次致信遠東廣播詢問信仰問題，諸如關於婚姻和離婚、罪、好人和壞人的問題等等。⁷³原來這位姐妹被排斥，加上擔心自己所犯的罪，時常覺得痛苦和「懷怒」，也因而有很多疑問，「如何做一個潔白的人」可能是她眾多問題的一個縮影：「我要走信徒純潔的道路，能做一個潔白的人，在這個問題上我又感覺有罪，怎能做一個潔白的人呢，使我思想上又難起來了……不知上帝有無去行方法使我潔白呢。你給我答題使我很完滿的解決，亦知怎樣行事為人，在這放任無恥的世代下，得到一盞指路明燈給我在暗中看到路行不致跌倒。」⁷⁴我們不曉得「放任無恥的世代」是否給占姐妹帶來特別的傷害，但這種對「純潔」特別的渴求，的確是她信仰上最執著的事情。

在人性扭曲的政治環境下生活，加上不能公開堅持信仰，很多基督徒也感到異常苦悶。一位聽眾則表達了文革時期不少信徒的共同經歷：「我們心靈枯燥，無聖經閱讀，也無禮拜堂可去參加事奉……。」⁷⁵事實上，在聽眾來信中，分享個人見證和提出信仰疑問的人超過三成，特別是在文革中後期，這一類信件的比例更為突出（圖 1）。

有聽眾表現了對信仰和苦難的看法，認為文革是讓人信仰更堅定的途徑：「您說的不錯，的確，惡劣的環境、艱苦的歲月、坎坷的路途，是主耶穌對我們的試煉，使我們的信心和意志受到更大的考驗。在我一段不長的生活道路中，也經歷了不少的艱險與挫折，曾不止一次的使我失去對未來的信心與希望，這可能是我的心靈太脆弱的緣故。然而，儘管這樣，我仍舊準備經受更嚴重的挫折，因為這與主耶穌為我們受難的痛苦比較起來，委實太小了。」⁷⁶

⁷³ 信件編號：19680704-M0258、19680629-M0278、19680801-M0348、19680831-M0388、19680801-M0438。

⁷⁴ 信件編號：19680801-M0348。

⁷⁵ 信件編號：19731227-M0113。

⁷⁶ 信件編號：19680531-M0198。

1960年代中國有「逃港」大潮，⁷⁷不少基督徒也萌生偷渡的念頭。所不同者，是他們為行動賦予宗教意義，將逃離中國借喻為「出埃及」或「再生」。例如有一位「中弟兄」曾幾次致信談及偷渡的事情，希望電臺為幾位認識的弟兄姐妹「出埃及」代禱。⁷⁸後來中弟兄致信電臺說：「四圍都是仇敵，什麼都可能發生的，我祈求落入父親的手中，不願意落進敵人的網羅！」⁷⁹四個月後，中弟兄再度來信說：「二月間我想離開苦難的埃及，失敗了，在最殘酷的地方過了近一個月。」⁸⁰大抵是他因偷渡失敗被捕，並且經受了難以想像的折磨。

有的聽眾有家人偷渡到港，希望電臺能夠幫助關照：「相信你也知大陸之人出港之難，特別偷關由〔猶〕如再生出世一樣，今吾兒能以順利到達此非主之能力乎？」並請電臺「以主之愛來教導他，從工作和行動合符主之要求」，還有幫助他早日辦理身分證以便能夠自由找工作。⁸¹

（三）來自尋道者的聲音

在表面上的「無宗教國度」，福音廣播也吸引了若干非信徒的收聽者，使他們成為基督教的尋道者。一位廣州的盲人聽眾自1973年開始給電臺寫信，提及自己幼時被人欺凌，後來因為收聽廣播決志成為信徒：

在一天的傍晚，我無意中聽到講故事，我很喜愛聽，就這樣我經常聽，我找到答案。加上我在危險時就得到主的保守看顧，我決定信靠祂、依賴祂，希望您能幫助我，使我沿著這條路，走到我們的父那裡去。⁸²

⁷⁷ 逃港大潮是指中共建國數十年來，中國民眾以偷渡方式從深圳非法越境進入香港的現象，有關詳情在陳秉安的《大逃港》一書中有詳細記載。參陳秉安，《大逃港》（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3）。大躍進期間的逃港潮，據統計單是1959年便有3萬人。1962年5月，偷渡到香港的非法入境者更高達每日5,000人。參 Frank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New York; London: Bloomsbury Press, 2011), pp. 140-141.

⁷⁸ 信件編號：19680102-M0018。

⁷⁹ 信件編號：19680130-M0098。

⁸⁰ 信件編號：19680515-M0178。

⁸¹ 信件編號：19740725-M0254。

⁸² 信件編號：19740701-M0214。

這位聽眾自此至 1978 年，每年都與電臺通信，內容主要是希望得到聖經的某些章節、詩歌和關於聖經問題的解答。雖曾因為密切通信被單位檢查和警告，但仍沒有阻止他與電臺來往。收聽廣播以及和電臺的通信是他信仰上獲得幫助的最主要來源。

另一位廣東的慕道友同樣因為收聽廣播而決志信主，他在信中說：「過去的我，迫於社會環境，對神是漠視的，他僅僅是一個陌生的名詞，甚至是代表外族文化侵略的代名詞，但是現實之經歷，特別是在動亂彷徨之際『良友電臺』給我帶來了神的聲音。秉承主的旨意，您對我無微不至的關切與鼓勵，使我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⁸³

一位同樣來自廣州，在文革期間被下放農村的「知青」，從高中時期就開始與電臺通信，交流自己的生活狀況和家庭情況，尋求在學業上和生活中的幫助。直到開始通信的三年後，他在信中感謝電臺的關心。對自己面臨的人生轉折，雖然現在一無所知，「不過我相信神是掌管萬有的，所以我要把自己的困難帶到神的面前，仰望能得到神的幫助，早日相信耶穌〔穌〕，承認耶穌是我們的救因〔恩〕。」⁸⁴

有一位北京的聽眾，感受到當下的環境，「我沒有樂觀，沒有自由」，「我很仇是〔視〕今天的社會，我很想到外國去……」。當他聽了廣播後，感到「很感動」，認為信仰上帝，可以令他「自由」及「樂觀」。顯然，他從來沒有聽說過基督教，因此，在信中寫成「我很信仰雞都教」。⁸⁵

文革時期，不論是否基督徒，均藉由福音廣播得以接觸宗教信息。誠然，也有不少聽眾收聽廣播的動因跟宗教信仰無關，而是希望通過和境外聯繫獲得生活幫助。這也反映出此時期人們對外界事物的好奇，而這好奇之心也源於對現有政權控制下的生活的不滿和懷疑。

⁸³ 信件編號：19740722-M0234。

⁸⁴ 信件編號：19770413-M0008。

⁸⁵ 信件編號：19770804-M0016。

值得注意的是，有自稱是「無神論者」或「唯物主義者」的聽眾來信：

我一向是無神論者……世界上已從科學基礎證實沒有鬼神……但要把耶穌〔蘇〕神化，人所作所為神知道，這點我不瞭解。主宰宇宙是人類團結，主宰個人命運是靠個人腦神經中樞清醒加上個人努力奮鬥，我的看法對嗎？⁸⁶

這位寫信人對自己歷來所受的教育和學到的知識產生懷疑，並且在信中詢問參加福音函授課程的相關手續，並索取教材。對福音的興趣和自己既有的知識之間的衝突，也顯示著當時國內知識份子接觸福音的想法。

《福音廣播》雙月刊也刊登了有一位從大陸來港的中國聽眾的見證，他曾經於文革時期當紅衛兵，後來於 1973 年逃到香港，「在遠東福音廣播公司的同工幫助下信奉了主耶穌」。他的經歷令很多親友「驚奇」，認為像作者這樣「受唯物主義多年教育、喜歡科學書籍而又火氣十足的青年人，是不應該迷信起來、消沉起來的」。⁸⁷這位青年原「紅衛兵」信仰的改變，反映出受共產主義教育的一代人，並非堅定地信仰「唯物主義」和「無神論」。在那個黑暗年代，許多原本批判基督教信仰的人，卻叛逆地「偷聽敵臺」，並且對基督教產生濃厚興趣，甚至成為信徒，這也反映出某種時代精神及心靈的轉變。

（四）敞開的門的聲音

除了理想的失落外，中國聽眾來信也反映出中美關係的轉變。從圖 3 可見，1973 年非信徒的來信比例首次超過基督徒，這與當時電臺開辦英語節目不無關係。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遜（Richard M. Nixon）歷史性訪問中國，為中美關係取得重大突破。隨著中美關係轉化，民間掀起一片學習英語的熱潮。英語開始取代俄語，成為新的學習目標。由於國家政策變化，中蘇交惡，中美關係略呈解凍，「聯美制蘇」成為新的外交對策。在這一時代氛圍下，英語學習蔚然成風。

⁸⁶ 信件編號：19680704-M0258。

⁸⁷ 傅友楠，〈一位大陸聽眾的見證〉，《福音廣播》，卷 8 期 4（1973 年 8 月），頁 10。

良友電臺自 1973 年開始特設英語學習的欄目，並轉播《美國之音》的英語教學節目，聽眾反映熱烈。1973 年的非信徒來信中，大部分都是欲索取英文教材。文革期間人們學習英語可能是出於對外界新鮮事物的關注，愈受重壓和限制，反而愈激發人們探索外面世界的強烈願望。

1974 年，一位北京聽眾來信表達對英語教學節目的要求：

聽到您們的廣播，有以下建議，請參考：一、把英教學時間，在每次播音時「早晚」再向後錯一小時，或在每次播音中再增加一次，前後兩次。二、請選取《英語日常會話》一書中一部分內容，我們這裡已大量翻譯出版。三、增加一些數學、理化、體運等方面一般普通用語，如二減二等於多少？雙方比賽是幾比幾？四、在講科學內容中，請講講現在太空探測。某星球有甚麼？如有生物，那末，生命來源又怎樣呢？再會！⁸⁸

另一位廣東省的聽眾是一位男知青，在 1974 年的來信中，憶述自己早於 1968 年底下放到農村，「我在整個中學六年中是學俄語的，近兩年多來，才自學英語。」⁸⁹同樣來自廣東的聽眾，更表示中國本地電臺的英語教學節目素質欠佳：「現在這裡雖然也有業餘英語廣播，但是沒有你們那裡的方式和方法好。所以我總是想你給我一份英語教材進行自學，看你能否同意呢？」⁹⁰不僅是沿海的廣東省，甚至來自雲南的來信，也表達了對英語節目的回應。⁹¹

從 1976 年開始，良友電臺的來信中仍有將近半數為非信徒，到 1978 年，非信徒來信的比例超過半數（圖 3）。1978 年的來信中，索取資源、尋求幫助者佔了極重比例（圖 1）。⁹²隨著政治形勢進一步寬鬆，不少人來信希望電臺能「指路」，幫助自己來港或是出國。此外，關注國際新聞、繼續收聽英語節

⁸⁸ 信件編號：19740322-M0104。

⁸⁹ 信件編號：19740328-M0124。

⁹⁰ 信件編號：19750515-M0009。

⁹¹ 信件編號：19740626-M0194。

⁹² 中央文件指出，「一九七九年一月至九月查獲寄來的宗教宣傳品有一萬零二百八十多件，較一九七八年同期增加了四倍。」〈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關於抵制外國教會對我進行宗教滲透問題的請示報告」〉，頁 14。

目自學英語的人也不在少數。中國緊閉的國門即將敞開，收聽宗教廣播的聽眾，可說是中國社會上最早與外面世界建立聯繫的人。

五、結 語

（一）第二社會的另類聲音

唯自文化大革命後，教堂盡遭封閉，新約亦已成灰，回首前塵，能無悵觸？⁹³

中國社會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歷了重大浩劫。當人們懷疑中國教會是否已經走到了「路的盡頭」時，卻發現基督教並沒有被「消滅」。教堂關閉，聖經被毀，牧職人員遭迫害，都沒有阻止基督教在中國的生存與發展。除了信徒對信仰的堅持外，福音廣播藉助大氣電波穿透鐵幕，覆蓋中國的大小城鄉，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在中共阻斷國內基督教與外國的一切聯繫時，福音廣播幾乎是唯一能將外界的宗教訊息帶給鐵幕內的人們的途徑。文革雖然反映黨國在主觀上企圖消滅宗教的政策，但基督教卻以另一種形態發展。基督教不僅在文革中「倖存」下來，更在文革之後迅速爆發成長，生機勃勃。⁹⁴

本文以 252 封中國福音廣播聽眾的信函作為重要的文獻，分析了 1966 年至 1978 年間來信所反映的情況。信件的数量雖然微不足道，但卻反映出中國社會在高度「一元化」的背景下，一群福音廣播聽眾的具體回應。對身處革命年代的聽眾而言，福音廣播未嘗不是一扇對外的窗口。通過大氣短波，讓他們能與另一個空間的訊息與意識形態連接，成為革命時代第二社會內的「另類聲音」。在革命時代，不論是收聽福音廣播以至致函境外的行動本身，均具重大政治風險，而這些投信者對基督教這「洋教」的探求，及寫信到境外「敵臺」

⁹³ 信件編號：19680202-M0108。

⁹⁴ 不僅基督教，中國宗教也呈現宗教復興現象。Ian Johnson, *The Souls of China: The Return of Religion After Mao*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17).

的行動，在在反映出中國民間社會對革命時代的「另類抵抗」。誠如馮客指出，文革期間，那些不再對共產主義教條抱有希望的人民，成為我們了解這股民間力量的重要憑藉。⁹⁵從民間思想的角度而論，文革也是中國當代「痛史」(history of pain) 及「歷史創傷」(trauma) 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章。⁹⁶可以說，中國聽眾的來信，為文革期間的「第二社會」留下前所未聞也極其立體的另一種聲音，也有助於我們了解草根民眾在動亂時代中的精神及心理面貌。

(二) 延續與斷裂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基督教取得高速增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公布了「中國基督教入戶問卷調查」的報告，根據 2008 年至 2009 年間在全國的大規模抽樣調查，全國基督徒人數為 2,305 萬（其中已受洗 1,556 萬，未受洗者 749 萬）。⁹⁷2018 年，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發表的白皮書，更將基督徒人口上調至 3,800 萬。⁹⁸不過，許多評論指出，這數字仍傾向保守，低估了中國基督徒的人口。⁹⁹

按中國官方解釋，基督徒的增長主要是由於 1949 年後開展三自運動的成果。2001 年三自運動慶祝五十週年時，曾這樣理解三自運動與當前中國教會發展的關係：

⁹⁵ Frank Diköt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People's History, 1962-1976*, Ch. 22.

⁹⁶ 白睿文 (Michael Berry) 著，李美燕等譯，《痛史：現代華語文學與電影的歷史創傷》（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另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Coping with the Culture Revolution: Contesting Interpretation,"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61 (2008 年 9 月)，頁 99-107。

⁹⁷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課題組，〈中國基督教入戶問卷調查報告〉，金澤、邱永輝主編，《中國宗教報告 201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 191。

⁹⁸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實踐》白皮書，2018 年 4 月 3 日。<https://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26514/1626514.htm> (2018 年 4 月 10 日檢索)。

⁹⁹ 楊鳳崗，〈實事求是面對基督教在中國的增長〉，《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暨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通訊》，期 35 (2014 年 7 月)，頁 4。根據 Pew Research Center 在 2014 發表的統計報告，中國基督徒人數為 6700 萬。Pew Research Center, *Report of Global Christianity*, http://www.pewforum.org/interactives/global-christianity/#/China_ALL (accessed January 15, 2019). 國斐，〈路的盡頭？從良友電臺內地聽眾來信（1966-1978）看文革動盪中的中國教會與社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神道學學士論文，2014）。

三自愛國運動最卓越的貢獻就是它摘掉了基督教「洋教」的帽子，為中國信徒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掃清了障礙；使中國基督教不再被帝國主義利用來作為破壞、顛覆新中國的工具，而成為團結信徒、建設國家、維護社會穩定的積極力量。……這個根本變化改變了人民對基督教的認知，為福音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良好的氛圍和心理認同基礎。¹⁰⁰上述官方的政治解釋，突顯了1949年在中國基督教史的斷裂意義，藉此為政治環境的變化與基督教增長間，建立膚淺的因果關係。根據這種官方論述，改革開放以降，中國政府撥亂反正，揚棄文革期間的極「左」宗教政策，再次落實中共建國以來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在為中國宗教發展提供重要環境。

1979年後中國基督教的增長，無疑跟文革後寬鬆的政治環境有關，但有關增長的關鍵，卻毋須簡化地理解為文革後的「突變」。通過本文的研究可見，文革時期的消滅宗教政策不僅以失敗告終，並且宗教在中國第二社會中，仍然得以保存甚至取得發展。改革開放時期基督教的發展，事實上跟文革期間的地下及非體制形式，有著密切的延續性。

柯文（Paul A. Cohen）在中國當代史研究中，提出「1949年分界」（1949 Divide）的命題，即是從延續（continuity）與斷裂（discontinuity）的角度，審視及挑戰關於1949年「革命」的意義。他認為1949革命的意義，很大程度上被中共的革命論述及冷戰氛圍所誇大。1949年的真實意義，與其反映單一革命帶來的翻天覆地式的分水嶺，毋寧是隱藏著延續與斷裂的複雜關係。¹⁰¹在文革史方面，克勞斯（Richard C. Kraus）也提出類似關於文革前後中國歷史的「延續」與「斷裂」的關係，他指出，「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路線，其起點其實也是在文革期間。¹⁰²

¹⁰⁰ 〈愛國愛教，同心邁向新世紀——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五十年的總結〉，《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五十周年慶祝大會專輯》（上海：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2001），頁17。

¹⁰¹ Paul A. Cohen, "Reflections on a Watershed Date: The 1949 Divide in Chinese History," in Jeffrey N. Wasserstrom, ed.,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ew Approach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29-32.

¹⁰² 克勞斯（Richard C. Kraus）著，李家真譯，《文化大革命》（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8），頁111-112。

通過本文的論述，可見延續與斷裂的視角，同樣適用於檢視 1979 年前後的中國基督教發展。1979 年以後基督徒人數的增長，跟文革期間的歷史也有著延續與斷裂的複雜關係。1982 年，中共中央公布的十九號文件中指出，基督徒的數目多達 300 萬，比 1949 年的 100 萬，增長達三倍。¹⁰³如果說文革期間消滅宗教的目的基本上實現了，那麼這 300 萬的基督徒，難道是 1979 年後才爆發式出現嗎？克勞斯在追問文革與改革的關係時，提出「中國改革的始點，究竟是一九七一年還是一九七八年，並不是一個愚蠢的問題」，¹⁰⁴置於中國基督教史的脈絡下，我們也可以改寫為：「中國基督教增長的始點，究竟是文革期間還是改革開放，並不是一個愚蠢的問題。」從中國聽眾來信所揭示文革期間第二社會中保存下來的另類聲音，正好有助我們以較宏觀的歷史進程來理解文革中後期與改革開放時期基督教發展間的延續性。

¹⁰³ 〈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頁 56。另參 Fuk-tsang Ying,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in China: 1918, 1949 and 2004,” *China Review*, 9:2 (Fall 2009), pp. 78, 81.

¹⁰⁴ 克勞斯 (Richard C. Kraus) 著，李家真譯，《文化大革命》，頁 111。

徵引書目

一、史料、檔案

〈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關於抵制外國教會對我進行宗教滲透問題的請示報告」〉（1980年3月4日），收入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務局編印，《宗教政策文件匯編》，內部文件，1988，頁10-18。

〈江西省公安局關於當前帝修反和蔣幫對我進行破壞活動的主要情況的通報〉（1976年6月30日），贛公政字027號，收入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6）。

〈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1982年3月），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綜合研究組、國家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規司編，《新時期宗教工作文獻選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頁53-7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註釋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課題組，〈中國基督教入戶問卷調查報告〉，收入金澤、邱永輝主編，《中國宗教報告201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190-212。

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五十周年慶祝大會專輯》，上海：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2001。

香港遠東廣播

「讀者來信」，1966-1978，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檔案室。

「廣東省寧弟兄訪問」，遠東廣播香港錄音室訪問紀錄，1972年5月1日。

“China Letters Responses Breakdown.” *FEBC International Chinese Program Consultant Report* #2. April, 1980.

Billy Graham Center, Wheaton College

“FEBC Broadcasts Freedom Message.” April 1976. Billy Graham Centre Archives, 209: FEBC Report, 1976.

“Minutes of Regular Meeting of Board of Directors.” May 23, 1970. Billy Graham Centre Archives, 209: FEBC, Reports and Minutes, 1970.

二、報刊、雜誌

《大公報》，1968。

《信息》，1981、1984。

《福音廣播》，1973、1975、1977、1998

三、專著

- 《上海宗教志》編委會，《上海宗教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
- 《上海廣播電視志》編委會編，《上海廣播電視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
-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廣東歷史大事記（1949.10-2004.9）》，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 白睿文（Michael Berry）著，李美燕等譯，《痛史：現代華語文學與電影的歷史創傷》，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
- 老鬼，《血色黃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 克勞斯（Richard C. Kraus）著，李家真譯，《文化大革命》，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8。
- 邢福增，《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增訂版）》，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12。
- 陳秉安，《大逃港》，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3。
- 福音證主協會中國研究中心編，《忠心的門徒》，香港：福音證主協會，1979。
- 趙天恩、莊婉芳，《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臺北：中國福音會出版有限公司，1997。
- 趙天恩、楊維美編，《赤地之穗：來自中國大陸的見證》，臺北：中國福音會出版社，1996。
- 羅伯·鮑曼（Robert Bowman）著，劉建慰譯，《行奇事的神——遠東廣播公司創辦人鮑曼的故事》，臺北：天恩出版社，2006。
- 羅廣武編著，《新中國宗教工作大事概覽（1949-1999）》，北京：華文出版社，2001。
- 蘇陽著，宋熙譯，《文革期間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
- Bowman, Eleanor G., and Susan F. Titus. *Eyes Beyond the Horizon*. Nashville TN: Thomas Nelson, 1991.
- Bush, Richard C. *Religion in Communist China*.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70.
- Cummings, Richard H. *Cold War Radio: The Dangerous History of American Broadcasting in Europe, 1950-1989*.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and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2009.
- Cummings, Richard H. *Radio Free Europe's "Crusade for Freedom": Rallying Americans Behind Cold War Broadcasting*.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and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2010.
- Dikötter, Frank.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New York; London: Bloomsbury Press, 2011.
- Dikötter, Frank.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People's History, 1962-1976*. New York; London: Bloomsbury Press, 2016.
- Ding, X. L. *The Decline of Communism in China: Legitimacy Crisis, 1977-19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Households of God on China's Soil*. Compiled and translated by Raymond Fung. Geneva: WCC, 1982.
- Howe, Barbara J., & Emory L. Kemp, eds., *Public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Malabar, Fla: R. E. Krieger Pub. Co., 1988.

- Johnson, Ian. *The Souls of China: The Return of Religion After Mao*.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17.
- Ledyard, Gleason H. *Sky Waves: The Incredible 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 Story*. Chicago: Moody Press, 1968.
- Short, K. R. M., ed. *Western Broadcasting over the Iron Curtain*. NY: St. Martin's Press, 1986.
- Street, Nancy L., & Marilyn J. Matelski. *Message from the Underground: Transnational Radio in Resistance and in Solidarity*. Westport, CT: Praeger, 1997.
- Veg, Sebastian, ed. *Popular Memories of the Mao Era: From Critical Debate to Reassessing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 Yang, Fenggang. *Religion in China: Survival and Revival Under Communist Ru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四、論文及專文

- 吳木，〈關於基督教的福音廣播〉，《當代宗教研究》，1993年第1期，頁44-47。
- 吳劍麗，〈竹幕升起：從良友電臺內地聽眾來信（1959-1983）看大門重開前後的中國教會〉，香港：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碩士論文，2010。
- 徐金洲，〈「關於建國欲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革軍管正確結論的再認識〉，《軍事歷史研究》，2012年第4期，頁91-103。
- 國斐，〈路的盡頭？從良友電臺內地聽眾來信（1966-1978）看文革動盪中的中國教會與社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神道學學士論文，2014。
- 楊鳳崗，〈實事求是面對基督教在中國的增長〉，《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暨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通訊》，期22，2014年7月，頁1-4。
- 鮑曼，〈中國福音廣播的歲月〉，《遠東廣播》，卷33期3，1998年5-6月，頁13-18。
- Cohen, Paul A. "Reflections on a Watershed Date: The 1949 Divide in Chinese History." In Jeffrey N. Wasserstrom, ed.,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ew Approach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27-36.
- Hankiss, Elemér. "The 'Second Society': Is There an Alternative Social Model Emerging in Contemporary Hungary?" *Social Research*, 55:1-2 (Spring/Summer 1988), pp. 13-42.
- Kao, Chen-Ya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Pentecostal-style Protestantism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Religion*, 24:2 (May 2009), pp. 171-188.
- Weigelin-Schwiedrzik, Susanne. "Coping with the Culture Revolution: Contesting Interpretation."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61，2008年9月，頁97-154。
- Ying, Fuk-tsang. "The CPC's Policy on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1949-1957: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3:89 (March 2014), pp. 884-901.
- Ying, Fuk-tsang.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in China: 1918, 1949 and 2004." *China Review*, 9:2 (Fall 2009), pp. 63-97.

Ying, Fuk-tsang. "Voices from the Bamboo Curtain: A Study of the Audience Response to the Christian Broadcasting in Maoist China (1959-1968)." In Philip L. Wickeri, ed., *Unfinished History: Christianity and the Cold War in East Asia*. Leipzig: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2016, pp. 111-131.

五、網路資源

- 《上海審判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http://www.shtong.gov.cn/dfz_web/DFZ/Info?idnode=81388&tableName=userobject1a&id=101298（2014年6月4日檢索）。
- 國務院新聞辦，《中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實踐》白皮書，2018年4月3日，<https://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26514/1626514.htm>（2018年4月10日檢索）。
- Pew Research Center, *Report of Global Christianity*, <http://www.pewforum.org/interactives/global-christianity/#/China.ALL> (accessed January 15, 2019).

**Unheard Voices from China:
The “Second Society” as seen from the Audience Letters
of Christian Radio Evangelism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uk-tsang Ying^{*} and Guo Fei^{**}

Abstrac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s usually regarded as “catastrophe,” “disaster,” and “chao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Throughout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ully implemented the policy of eliminating religion. All religious institutions were completely destroyed. Religions could only survive in non-institutional, underground forms. To break through the Bamboo Curtain, religious message were conveyed via shortwave radio from Hong Kong to Communist China. By investigating the valuable and rar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audience letters received from China, this article revisit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during the tumultuous yea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existing 252 audience letters written between 1966 and 1978 reveal much about grassroots Chinese spiritual inquirers and Christians. This study begins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ld War and explores the ideology reflected in the religious broadcasts to Communist China. The official and popular responses to the “enemy station” will also be addressed. As well, based on these audience letters, this article also helps to construct a collective account of those unseen grassroots Chinese and rediscovers the “unheard voices” from the “Second Societ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Keywords: religious broadcasts, audience letters,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ese Christianity

* Divinity School of Chung Chi Colleg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Divinity School of Chung Chi Colleg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